



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 與女性倖存者

劉珠利

壹、研究背景

臺灣家庭暴力防治法在西元 1998 年制定，期間經歷多次修法，在西元 2005 年將同居關係納入家庭成員的定義之中，西元 2015 年將有親密關係但未同居的暴力關係納入保護的範圍之中（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這樣的修法過程顯示在實務過程中，經法律認可的婚姻關係不再是暴力發生的唯一關係情境，未婚同居，未婚未同居都是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的關係情境，顯示助人專業者所面對的親密關係暴力多樣性數量已經多到必須納入法源，才能提供有效協助。

統計數據同樣也證明了親密關係暴力的多樣性。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家庭暴力統計分類顯示，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的類型以婚姻關係中 / 離婚 / 同居關係這一類別為最大比例，約占該年度所有家庭暴力類型的 60%（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6）；又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司的統計資料顯示，成人家庭暴力兩造關係的型

態，就親密關係型態（不含家屬關係、直系血親、旁系姻親等關係）而言，以現有婚姻關係且目前共同生活中的關係型態為最多，而現有同居關係居第二位，現有婚姻關係但是目前分居中則居第三位。此外，就以現有同居關係通報為親密關係暴力的個案量單獨來看，臺灣各縣市在西元 2012 年開始明顯且逐年增加。以新北市為例，西元 2011 年為 748 人，西元 2012 年為 1,081 人，西元 2013 年為 1,181 人，西元 2014 年為 1,214 人，西元 2015 年為 1,404 人；以高雄市為例，西元 2011 年為 815 人，西元 2012 年為 1,028 人，西元 2013 年為 1,041 人，西元 2014 年為 1,001 人，西元 2015 年為 1,033 人（衛生福利部保護司，2016）。前述的統計數據呈現目前臺灣的親密關係暴力中，除了婚姻關係暴力外，屬於同居關係的暴力型態值得關注。

臺灣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已經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許多不同身份的女性倖存者逐漸浮現，值得注意的是，實務工作的

流程與處遇方法仍然保持當初立法時協助已婚、年輕女性倖存者的方式，且運用這種工作模式協助不同身份的女性倖存者，僅有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0 條中寫明，檢察官、司法警察等簽發拘票時，尤應注意被害人為兒童、少年、老人、身障者等或有其他無法保護自身安全者，提醒不同身份者的安全需要（全國法規資料庫，2018）。重視服務使用者的獨特性是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家庭暴力防治法是臺灣所有法律中唯一將未婚同居納入保護範圍的法律（民法將同居者列為家屬，但未有其他保障），如果家庭暴力防治法未能有效回應這類型親密關係女性倖存者的需要，容易讓她們變成被法令政策排擠的人，因此到了應該擴展實務工作模式的時間了。

有鑑於此，本文嘗試從現有臺灣與西方文獻的整理討論來瞭解：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的內涵為何？協助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的實務原則為何？期望探討的結論能夠作為協助這類型女性倖存者的實務工作基礎。

未免失焦，本文集中討論未婚同居異性關係，因為臺灣甚少有文獻討論此主題，反而有較多文獻討論未婚同居同性關係；又親密關係暴力多數倖存者為女性，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倖存者也以女性為主，重要名詞定義如下：

一、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

如同配偶關係一樣住在一起的男女兩個人有羅曼蒂克的感情與關係，但是並未有法律上的結婚關係（Stet, 1991），

本文集中於探討異性戀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亦即，一男一女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

二、親密關係暴力

有羅曼蒂克的感情與關係的男女間發生身體上、精神上、經濟上的騷擾、控制、威脅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衛生福利部，2016）。

貳、臺灣對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的態度

楊靜利（2004）以臺灣的結婚戶籍資料來推估，指出臺灣同居人口數可能有三種數字：203,720，或 379,776，或 440,508，若是以 25-29 歲的適婚年齡的人口數量來說，約占適婚年齡者的 2.75%。楊靜利（2004）認為，臺灣的社會已經培養了未婚同居的溫床，例如：晚婚、終身未婚、以及婚前性行為增加、離開父母另外居住的比例增高等，但是這樣的比例與歐美國家相較之下是不高的。這份統計已經時隔多年，近年並未出現新的統計數據，倒是有學者開始討論未婚同居現象與面臨的問題。

陳毓容（2011）指出，目前臺灣雖然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的比例應該不少，但是考慮到社會價值觀與規範，多數人還是會隱匿未婚同居的事實，因為在臺灣多數人一想到未婚同居異性關係很快就會和婚前性行為劃上等號。既然未婚同居不是社會價值觀容許的行為，在這種氛圍下仍然選擇未婚同居的人，又是何種人口群呢？

鍾宜吟和蔡明璋（2008）以臺灣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二次的資料進行二次資料分析並進行訪問，瞭解臺灣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的狀況，結果顯示，臺灣選擇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年紀偏年輕、教育程度偏低、已經結過一次婚的人也傾向選擇未婚同居，而且未婚同居對於之後選擇結婚的婚姻滿意度反而有不利因素，婚姻滿意度反而偏低。鍾宜吟和蔡明璋（2008）認為這樣的結果顯示臺灣選擇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是屬於特定人口，這樣的特定人口可能是年輕、經濟貧窮的人，亦即同居是窮人的婚姻的型式；同時，選擇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也可能是個人主義觀念較強烈者，因此進入婚姻之後對於婚姻的責任感到不適應。此外，男性與女性選擇未婚同居之後，面對的壓力並不相同，陳毓容（2011）指出在父權價值觀較為明顯的臺灣家庭，對於男女未婚同居的態度並不一樣，對於男性未婚同居抱持較為默許的態度，但是對於女性未婚同居則認為是恥辱，同時女性未婚同居還需要承擔懷孕、墮胎等的問題，因此女性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比男性同居者面臨更多的壓力與不利因素。顯示臺灣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在同居前後似乎都位居於社會邊緣的位置，尤其女性面對的邊緣化與壓力更大。

前述資料是發表於十年前的社會變遷調查，臺灣社會在這幾年十分快速變遷，選擇未婚同居的狀況時常聽聞，王維邦和陳美華（2017）以 2012 臺灣社會變遷

調查：六期三次性別組的資料進行二次分析，結果發現贊成同居者已經多過不贊同者，男性與女性的看法並無差異，國人不再對同居的女性有汙名的看法，同居形式的彈性可能是國人逐漸接受同居的原因，因為同居也可以是單身和離婚者替代婚姻的關係型式，同時同居關係也可以重回婚姻關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超過一半以上的人認為婚姻跟生育是連帶的，亦即在婚姻關係中養育下一代才被認為是正當的，婚外生子不具文化正當性，相信婚姻是快樂者愈不認為同居是婚姻的替代形式。這個研究最後仍然指出，國人仍然是偏向認同傳統的婚姻家庭制度，贊成同居者比例增加並不代表對於以男性為主的婚姻家庭的態度已經鬆動。對照鍾宜吟和蔡明璋（2008）的社會變遷資料分析結果發現，當未婚同居只是“不牽涉其他人事物的兩個人的事”時，目前臺灣社會能夠逐漸寬容的接納，不會視未婚同居是邊緣人口的選擇，但是當未婚同居衍生其他議題時才會落入被排擠與邊緣化的處境。

西元 2016 年下半年臺灣開始討論同性婚姻制度時，意外地將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議題放到臺面上，也同樣呼應前面所說的臺灣社會對於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的態度：

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擬從修改現行法方向改為另訂專法模式，規範同性伴侶間的權利義務。據了解，法務部擬訂定一「伴侶同居法」，僅限於同性，不能擴及到異性，怕破壞婚姻制度（管婺媛、程平，2016）。

因此，在臺灣社會普遍的價值觀，異性的同居關係仍然被視為是破壞婚姻制度的關係。換言之，臺灣對於未婚同居異性關係僅是對“二人住在一起”這件事在態度與認知上表現出同意，但是當這樣關係型式和生育、家庭責任等概念放在一起思考時，就變成不是能夠被認可的關係型式。此外臺灣社會選擇建立未婚同居關係並未如歐美社會一樣已經成為普遍的現象。

參、臺灣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研究

近年來臺灣對於未婚同居親密關係暴力的期刊論文，均集中於了解同志關係（呂欣潔，2011；李姿佳，2012；潘淑滿，2012；林育陞，2018），對於異性關係的未婚同居親密關係暴力的研究僅有四篇。楊嘉玲和趙淑珠（2009, 2011）指出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大學女性倖存者雖然不需要考慮財產、子女監護權等問題，然而因為社會壓力的關係，使得她們更為困難離開同居關係。較近期的研究則指出，當同居雙方的關係滿意度愈正向，親密關係發生頻率的風險會降低（蔣蕙如，2016）。然而以同居大學生關係的本質攏統來陳述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關係的樣貌，仍然無法一窺這類型親密關係暴力的全貌。以下兩篇研究就是目前臺灣僅有討論一般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的研究。

羅燦燦（2011）針對異性關係的未

婚同居親密關係暴力的研究指出，遭遇未婚同居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的受訪者多數認為，受暴的原因來自於當下生活情境壓力導致的，例如財務問題，雙方情感生變問題，或是吸毒／酗酒導致；這類型的倖存者也指出，在未婚同居的關係中經歷暴力相向的經驗，對日後的親密關係的確產生負面的影響。然而可惜的是，此研究分析方法僅將訪談內容進行初層次主題式歸納呈現，並未進行受訪者相關因素的深入闡釋，因此無法從研究中深度了解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發生暴力的全部面貌。林盈秀和童伊迪和鍾道銓（2015）以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方式收集 6 位受訪時年紀在 25 歲左右、青少年階段與男性同居未婚懷孕並經歷懷孕階段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發現這群受訪者因為原生家庭有許多不利因素導致她們以同居懷孕作為離開原生家庭的方法，然而因為年輕、教育與工作技能不高導致所擁有資源有限而必須依附男性同居人，再加上社會對於青少年未婚懷孕抱有偏見歧視，使得這群受訪者在遭遇暴力時，常常因為無路可走而繼續留在暴力關係中。雖然質性研究方法無法進一步將結果推論至所有的人，這個研究生動的指出未婚同居的青少年受困於環環相扣的不利因素之中的確符合實務工作者一起工作的案主的狀況，是值得參考與深思的研究。

比較臺灣針對法律認可的婚姻中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情境與女性倖存者所採取的因應方式的研究結果（劉珠利，

2012），和羅燦煒（2011）與林盈秀等人（2016）的研究結果差別不大，是否意味法律認可婚姻關係暴力與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沒有差別？由於臺灣有關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的研究很少，因此筆者嘗試整理西方有關未婚同居較完整的理論與研究，作為深入了解差異的基礎。

肆、未婚同居關係中男性施暴於女性的相關理論

一些學者採用社會學與心理學理論，作為瞭解未婚同居異性關係中的暴力問題。Cherlin（1978）以社會學中的制度（institution）的觀點為基礎，提出“incomplete institution”（未完善的制度）的觀點來解釋未婚同居異性關係，這個概念指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在社會上並不是一個成形的制度，因此尚未發展出相關的規範，因為沒有清楚規範，所以容易產生壓力，而所產生的壓力也缺乏相關的規範來處理，因此未婚同居異性關係比其他種類的關係都容易發生問題，暴力就是其中一種問題。換言之，未婚同居關係面臨許多的模糊以及模糊所帶來的問題，反而不是因為自由而帶來許多美好經驗，打破過去對於未婚同居的想像。這個觀點也成為日後一些實證研究的理論基礎。

生態系統理論將影響問題的環境分為鉅視與微視的觀點，也是理解未婚同居異性關係暴力的基礎。Desmond（1989）採用鉅視的社會因素（social factors）以

及微視的個人環境因素（peculiarities）來分析為什麼美國在1990年代的統計數據都呈現，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的受暴女性多過於有合法婚姻關係的受暴女性。Desmond（1989）認為，在鉅視的社會因素方面，同居關係的施暴男性多數傾向於認同父權文化價值，經常面臨父權文化價值與現實同居關係本質的衝突，也可能多數隸屬於較會採取暴力來處理問題的社會階層；在微視的個人環境因素方面則認為，同居的施暴男性面對較多同居關係的不穩定／規範模糊狀況，在具高度規範的社會中，這樣的關係容易產生壓力，進而產生忌妒等情緒，因此發生毆打女性，這是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的比例高過於合法婚姻關係者的可能原因。Desmond（1989）的微視觀點和Cherlin（1978）的未完善制度的概念倒是不謀而合，都指出規範模糊的問題，而且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規範模糊的觀點，也讓後續的實證研究看到同居者面對的壓力與因應。

社會脈絡的角度則從社會支持的角度來看未婚同居關係面臨的壓力，認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較難獲得社會或是親友的認同，因此所得到的社會支持也較少，比較容易產生壓力（Skinner, Bahr, Crane & Call, 2002），不同於前述理論所指出的關係規範模糊的解釋，但是讓我們理解未婚同居關係的壓力源是多重的。

此外，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認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之所以選擇同居而不是結婚，其對於伴侶的關係就是比較不傳統，亦即，是能夠接受

離婚是解決相處問題的方式的人，也因為這樣的態度，所以對於伴侶相處關係上的某些問題是比較堅持而且不妥協的，也因此影響了對於關係的承諾；選擇差異（differential selection）的角度認為，溝通技巧較差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很容易就選擇結束關係而不是選擇以溝通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選擇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本身可能對於親密關係原本就是比較挑剔的人（Skinner, Bahr, Crane & Call, 2002）。所以社會學習理論與選擇差異觀點都認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是認同某種價值觀，例如：不妥協、不承諾，甚至不是以溝通來解決問題，這樣的價值觀就形塑關係的本質與暴力發生的機會。

總結來說，社會不認同、社會支持少、二人關係規範模糊、個人的溝通與價值觀都是未婚同居異性關係暴力發生的成因。

伍、西方國家對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與女性倖存者相關研究

西元 1980 年代，是西方對於未婚同居異性關係仍然抱持負面看法、法律也未給予合法地位的年代，當時學者已經開始研究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與已婚關係所發生的親密關係暴力的樣貌。時至今日已經累積許多實證研究，以下就是這些研究結果的整理。

一、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發生暴力的數量多過於婚姻關係者，尤其以年輕、

來自貧窮環境、生活存在許多不利因素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為主

西元 1980 年代西方的概念是：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多數抱持對於兩性關係之間較為浪漫的看法，對於父權社會的權力概念是比較前衛的，因此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較少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問題。為了瞭解這樣的假設是否成立，Yllo and Straus（1981）以美國年紀在 18—70 歲、目前尚與伴侶同住的人為研究對象，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並輔以訪問 40 人收集較深入的資料，問卷總共回收 2143 份問卷。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數據多過於合法婚姻者，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幾乎是合法婚姻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的 4 倍，推翻假設，但是研究也顯示並非所有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都是一樣的狀態，年齡在 30 歲以上、收入高、同居超過 10 年以上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比例就非常的低，年齡在 30 歲以下、貧窮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比例就很高。後來美國有了大規模的社會變遷調查，Stets（1991）是第一位以美國的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資料庫的 13017 份問卷進行有關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是否比合法結婚親密關係暴力的數量為多的學者，Stets（1991）抱持和 Straus（1981）不同的假設，認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在理論上是屬於經驗到較多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的群體，所以社會控制對未婚

同居異性關係者的控制力量較少，容易發生親密關係暴力，前述資料庫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比例約占所有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的 14%，合法結婚者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比例約占合法結婚者的 5%，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比例的確多過於合法結婚者。十多年後 Kenny and McLanahan（2006）以同一份資料庫中 13017 份資料進行二次資料分析，了解未婚同居發生異性親密關係暴力的數量是否真得多過於合法結婚者。結果也顯示的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暴力的比例高過於已婚者，然而這個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發生親密關係暴力、最後陷入多重問題者多數是教育程度較低、成長於單親家庭之中、對於關係承諾較低的未婚同居群體，和 Straus（1981）的研究結果雷同。

除了美國之外，相同情形也在加拿大與香港（西化很深的城市）獲得證實。在加拿大，未婚同居的人數已經和合法結婚者一樣多，Brownridge（2008）以二次資料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加拿大統計局的人口資料發現，現階段不論是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或者是合法結婚者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倖存者的數量，都比過去減少，然而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倖存者的數量還是多過於合法婚姻的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Wong, Choi, Fong, Choi, Wong, So, Lau and Kam（2016）以香港二家醫院急診室的病例分析，發現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的女性倖存者身體多處受暴的比例是已婚女性倖存者的

兩倍。因此諸多統計分析都顯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暴力的比例多過於已婚者，時間並未改變此一現象。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何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暴力的比例多過於已婚者？除了 Kenny and McLanahan（2006）所指出的某些群體較易發生之外，Stets（1991）研究發現，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的社會融入（social integration）甚至多過於合法結婚者，因此並不是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經驗到較多社會孤立所以容易發生親密關係暴力，反而是其他的因素，例如：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的年齡較輕、社會經濟階層較低、屬於少數族群、對於兩人之間親密關係的承諾較低、有較多數量是憂鬱症患者的因素，增加了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危險因素。因此選擇未婚同居這個因素並不會單獨是一個促使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的主要因素，反而是圍繞著選擇未婚同居的其他危險因素與這類型關係相互互動後容易發生親密關係暴力。因此研究結果清楚的聚焦到，社會經濟階層較低、年輕、對兩人承諾低是較易發生暴力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的高危險族群。真正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的狀況，是社會上較為邊緣無力解決問題的一群人口，是社工員真正要關心的一群人口，進一步提醒實務工作者對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生活的危險因素要仔細檢視。

既然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比例較高，且多數是年輕、社會經濟階層低、對關係承諾低的人口群，那麼

女性倖存者是否能夠面對 / 因應相關的問題？Yllo and Straus（1981）就提醒因為相較於合法婚姻者，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在家人 / 親友方面獲得的支持可能較少，在正式的法律或是社會福利方面的支持也可能幾乎為零，且前面的研究與社會脈絡的角度已經指出多數為年輕且社會經濟階層低，女性倖存者個人累積可用來解決問題的資源相對是較少的，這方面的問題是實務工作者協助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的重要焦點。

二、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特徵是低承諾、充滿不確定性與不恰當相處模式，易引發暴力

未婚同居異性關係會比已婚關係較令人快樂嗎？Skinner et al.（2002）運用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資料庫進行二次分析的研究，驗證：長期（超過五年）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比合法結婚者在關係上感受較快樂。結果顯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感受他們關係的滿意 / 快樂程度比合法結婚者要低，也較不能接受生活中某些家務固定由某人來做。Brownridge（2004）以加拿大在西元 2000 年初的數個以加拿大統計局大規模電話訪問 18 歲以上，12300 位女性所建立的資料庫（Statistics Canada'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二次分析實證研究指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比合法婚姻者的生活方式較為有距離，有可能是因為同居者對於兩人之間的關係覺得較沒有安全感因此

較不願意發展較緊密的生活方式所導致，這是因為未婚同居者來自年輕、社會經濟階層低的環境、失業或是也經歷過暴力等背景的關係。這樣的結果打破一般認為被柴米油鹽醬醋茶環繞的已婚關係是較令人不快樂，而較自由沒約束的未婚同居關係是快樂的刻板印象，相反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因為自由而有距離，沒有安全感，進而令人不滿意。

為何較沒有約束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反而較不快樂？Skinner et al.（2002）認為可能的原因來自長期同居卻未合法結婚的關係充滿個人主義與自主性，也充滿許多不確定性，導致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感受到關係較不快樂。Brownridge（2004）也認為缺乏安全感的關係容易導致較不恰當的相處行為、較大的社會孤立、以及酒癮與憂鬱症，對於未來的期待不同，進而造成衝突與暴力。最新的一份以美國俄亥俄州的青年為對象的長期性研究也顯示，兩人關係的本質是發生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未婚同居異性關係如果屬於低承諾、高束縛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高危險關係，因為讓未婚同居者在模糊與缺乏承諾的關係中，自行尋找角色定位與處理問題的規範是不容易的，也就容易引發暴力問題（Manning, Longmore & Giordano, 2018）。

前述的研究結果再再驗證了 Cherlin（1978）所提出的未完善的制度的概念、社會學習理論以及選擇差異角度所提出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的本質與選擇未

婚同居的人對於親密關係的認定不同於已婚關係及已婚關係者的看法，亦即，在諸多理論與實證研究的相互印證下，未婚同居關係與選擇未婚同居者的本質樣貌逐漸清晰。

三、同居關係常成為來自不利因素成長背景的女性的庇護所，未婚同居女性倖存者遇到暴力問題時，選擇是否離開的思維與已婚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不同

一些研究都顯示，貧窮女性的同居關係都不會太長，最後可能都以分手結束而不是結婚，即使在同居期間懷孕生子，也多數以分手收場。如果貧窮且又有其他不利因素的女性，例如：成長過程已經經歷創傷經驗、或是有精神方面的問題等，選擇同居的原因、同居關係的品質、以及最後關係的結束都不同於屬於較好教育／社會經濟階層的女性。Farber and Miller-Cribbs (2014) 以 32 位白種人、高中程度、貧窮、曾經與人同居過的女性為研究對象，進行深度訪問，結果顯示，受訪者的同居關係都是複雜且不穩定。因為受訪者在孩童時候都經歷過創傷且來自貧窮的家庭，這些創傷經驗結合其他教育、社會、經濟、情緒等因素使得受訪者在年輕的時候選擇了有很多問題的伴侶，結果使得關係發生很多問題，例如：暴力等問題。最震撼的研究結果是，受訪者是在與男性同居關係中，尋找情緒與經濟的庇護所，這樣的結果就會導引出一個暴力關係最需要思考的問題：來自不利環境的女性倖存者

是否及如何離開暴力關係？

目前能夠找到唯一一個研究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是否離開暴力關係的研究，是 Huang, Postmus, Vikse and Wang (2013) 的研究。Huang 等人 (2013) 以美國脆弱家庭與兒童福利資料庫 (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 的資料進行二次分析，以了解肢體暴力、經濟暴力對於合法婚姻關係、未婚同居異性關係、以及其他關係 (含朋友關係、已無聯絡等) 組成 (union formation) 的影響。結果顯示，持續發生暴力對於關係的組成是有影響的，換言之，以資料收集的第一年是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的女性問卷受試者來分析，當她們在持續遭遇伴侶的虐待，到第五年再收集她們的資料時發現，超過半數的人已經改變她們與伴侶的關係，30% 的女性受試者已經離開她們的伴侶；以資料收集第一年是合法婚姻關係的女性問卷受試者來分析，當她們持續遭遇伴侶的虐待，到第五年再收集她們的資料時發現，85% 的女性受試者仍然維持合法的婚姻關係，15% 的女性受試者已經不再維持合法的婚姻關係。Huang 等人 (2013) 指出，當女性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之後的種種情況，必須放在當時與伴侶的關係型態的脈絡下來分析與討論，換言之，女性倖存者當下是屬於合法婚姻關係或者是未婚同居異性關係，在面對親密關係暴力是有不同思維，未婚同居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傾向選擇也較容易離開。然而這個研究並未深入呈現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暴力後，在離開與否的思維決定過程為何？為

何未婚同居者傾向選擇與容易離開？殊為可惜，而且當來自不利環境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女性倖存者將同居關係視為經濟與情感的庇護所時，會選擇離開嗎？如何離開？目前尚無法回答，未來需要投入研究來理解這個問題，做為實務工作的依據。

四、每一個文化都有未婚同居異性關係暴力存在

除了北美洲的國家之外，其他國家的情況為何？Abramsky, Watts, Garcia-Moreno, Devries, Kiss, Ellsberg, Hansen and Heise (2011) 以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在 Bangladesh, Brazil, Ethiopia, Japan, Namibia, Peru, Republic of Tanzania, Samoa, Serbia, Thailand 等國家所收集的家務調查 (household survey) 大型資料庫進行二次分析，結果顯示並不是只有西方國家已經有很多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所以才會有數量較多的親密關係暴力，比西方國家在兩性關係上較為保守的國家，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與其他危險因素的結合，也是造成親密關係暴力的因素。同樣的結論也顯示在另外一個橫跨五個拉丁美洲國家的調查研究之中。Flake and Forste (2006) 以橫跨 Mexico, The Dominican Republic, Haiti, Nicaragua, Peru 五個國家所收集的人口與健康調查資料庫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進行二次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的女性，要照顧大家庭，缺乏做決定的權力，男性伴侶又是酒癮者，教育程度低，是

最容易成為親密關係暴力倖存者的高危險群。因此未婚同居親密關係暴力是每一文化都存在的現象。

綜言之，美國、加拿大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研究都顯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數量多過於合法結婚者，原因是來自於圍繞在選擇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背後的相關因素與這類關係的互動，因此了解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整體的生活與關係脈絡是研究這個主題很重要的一個角度。女性倖存者在進入未婚同居關係前後，生活都與許多不利因素交纏，而暴力發生後，正式與非正式資源缺乏，是女性倖存者的困境。

陸、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的內涵與實務工作上的啟示—脫離不利與脆弱的位置與循環

前述西方研究顯示，選擇未婚同居的人是一群特殊的人口，鍾宜吟和蔡明璋 (2008) 指出臺灣未婚同居者大多是來自年輕貧窮的人口，而王維邦和陳美華 (2017) 的分析雖然並未指出未婚同居是一群特殊人口，但是也指出大部分的臺灣人認為婚姻和生育是連帶的，換言之，會在未婚同居關係中生育並非多數臺灣人的信念，間接地指出這是一群不同信念的特殊人口。因此在臺灣，未婚同居的確在社會經濟位置或是思維上是屬於特殊的人口。

前述西方研究顯示未婚同居異性關係本質是低承諾、不確定性高、缺乏規範、

面對高度社會壓力，因此當關係問題產生或是未婚同居關係和其它問題結合時，容易變得不堪一擊無法承受壓力；羅燦煥（2011）的研究指出臺灣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發生暴力是因為當時生活壓力所導致，顯示未婚同居關係本質是無法承載壓力，也就不難理解容易產生暴力。

來自弱勢背景的未婚同居異性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有其獨特狀況，Stet（1991）與 Farber and Miller-Cribbs（2014）都共同指出，未婚同居女性如果來自不利環境、幼年充滿創傷經驗、貧窮及社會輿論壓力等，這些不利因素讓她們選擇未婚同居作為庇護所，也讓她們在維持關係上產生困難，再加上社會的歧視與壓力，讓她們位處孤立，暴力發生之後對關係、身心上的傷害，卻也無力解決，進而進入多重問題的漩渦之中。林盈秀等人（2016）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未婚同居者經常落入相互交錯的問題循環之中難以自拔的困境，顯示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容易出現的相互交錯的問題循環，是社會工作實務上必須重視的部分。西方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女性倖存者似乎有較高的比例選擇離開，和楊嘉玲和趙淑珠（2009,2011）研究指出臺灣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離開對方更為困難的結果不一樣，社會文化思維及未婚同居異性關係者在面對暴力時的不同思維，值得實務工作注意。正式與非正式系統對於未婚同居女性是不友善的，尤其是臺灣，因此女性倖存者在生活重建過程中有其特殊性。然而未婚同

居異性關係者，尤其是來自不利環境且將未婚同居關係視為庇護所的女性倖存者是否離開以及如何離開的問題，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來回答。

最發人深省的是 Cherline（1978）所提出的“incomplete institution”（未完善的制度）的概念，是作為理解未婚同居關係暴力的最佳統整架構。人類的制度意指規則和運作模式、規範個體行為的社會結構，包含價值與秩序，以未完善的制度解釋未婚同居關係中的缺失，及難以撐起生活在此制度中的人的需要與問題，相對於完善制度的已婚關係，不難理解未婚同居關係本質上的脆弱，也可以理解當這樣的關係型式延生生育、暴力、吸毒/酗酒問題後，就缺乏“正當機制”來處理相關問題，使得同居關係中的兩人陷入混亂無所適從，尤其是女性倖存者更顯孤立。同時女性倖存者本身如果來自充滿不利因素的成長環境，這些累積的不利因素同時成為她們選擇伴侶，解決關係衝突，營造共同生活時的阻礙，如果所選擇的男性是有犯罪傾向，酒癮藥癮等問題的人，問題就更為複雜，脫離受暴處境或是重建生活就更為困難。

經由與西方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的對話，總結來說未婚同居關係者整體的生活與關係脈絡才是理解與協助的重點。由於這類型親密關係本身缺乏機制來處理問題，暴力倖存者多數可能是來自充滿不利因素的成長環境，教育程度不高，本身或是環境所能提供資源原本就少，在年紀

很輕的時候就必須面對經濟等壓力，因此在親密關係暴力發生之後，有哪一些正式資源可以協助他們，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除了目前家庭暴力防治體系可以提供的協助資源之外，倖存者本身有多少優勢，可以協助她們脫離危險與脆弱的環境，就是一個協助她們的重點。因此在協助這類型倖存者時，除了必要的人身安全評估以及接續評估結果的後續處理之外，建議實務工作者更應該特別注意：

一、釐清女性倖存者生活環境 / 生命中 / 脆弱因素有哪一些，進一步了解這些因素是否讓女性倖存者步入未婚同居的關係型態之中。

二、女性倖存者的未婚同居關係中，危險 / 脆弱因素有哪一些？這些關係中的危險因素，是否與女性倖存者進入未婚同居前，生活環境 / 生命中 / 脆弱因素相互互動而行程更為危險與脆弱的關係？

三、女性倖存者如何脫離危險的因素，生活於沒有危險因素的生活型態之中？

當未婚同居異性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的獨特需要被理解與處理，家庭暴力防治的功能才能發揮。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未婚同居、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

參考文獻

王維邦陳美華（2017）。〈非常規性實踐的性別化態度：男「性」特權、性別分工與婚家體制的角色〉。《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40期，頁53-105。

Doi:10.6255/JWGS.2017.40.53.

林育陞（2018）。〈男同志親密關係暴力探討〉。《諮商輔導》，第386期，頁36-39+55。

林盈秀 童伊迪 鐘道銓（2015）。〈親密關係中的受暴經驗—以未成年鳩段懷孕女性為例〉。《臺灣社會工作學刊》，第15期，頁51-80。

李姿佳（2012）。〈親密關係另一篇章～同志伴侶暴力〉。《婦研縱橫》，第97期，頁16-21。

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家庭暴力防治法沿革》。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A E%B6%E5%BA%AD%E6%9A%B4%E5%8A%9B%E9%98%B2%E6%B2%BB%E6%B3%95>。瀏覽日期：2016年11月4日。

全國法規資料庫（2018）。《家庭暴力防治法》。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A>

- E%B6%E5%BA%AD%E6%9A%B4%E5%8A%9B%E9%98%B2%E6%B2%BB%E6%B3%95 瀏覽日期:2018年8月9日。
- 蔣蕙如(2016)。《關係一致性與同居經驗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影響：對偶分析》。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呂欣潔(2011)。〈櫃中荊棘：同志親密暴力V.S.現行家暴網絡〉。《婦研縱橫》，第94期，頁35-44。
- 潘淑滿(2012)。〈巢起巢落一女同志親密暴力、T婆角色扮演與求助行為〉。《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7期，頁45-102。
- 羅燦煥(2011)。《我國同居親密關係之樣態、歷程及服務需求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
- 管嫫媛、程平(2016)。《法部擬訂「伴侶同居法」限同性且無婚姻忠誠義務》。瀏覽自：
<https://tw.news.yahoo.com/%E6%B3%95%E9%83%A8%E6%93%AC%E8%A8%82-%E4%BC%B4%E4%BE%B6%E5%90%8C%E5%B1%85%E6%B3%95-%E9%99%90%E5%90%8C%E6%80%A7%E4%B8%94%E7%84%A1%E5%A9%9A%E5%A7%BB%E5%BF%A0%E8%AA%A0%E7%BE%A9%E5%8B%99-064800384.html>。瀏覽日期：2016年11月27日
- 衛生福利部保護司(2016)。《家庭暴力兩造關係統計》。網址：
http://www.mohw.gov.tw/CHT/DOPS/DM1_P.aspx?f_list_no=806&fod_list_no=4620&doc_no=44891 瀏覽日期：2016年9月8日
-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6)。《97年至104年家庭暴力事件各類型件數》。網址：
http://www.mohw.gov.tw/CHT/DOPS/DM1_P.aspx?f_list_no=806&fod_list_no=4620&doc_no=42890 瀏覽日期：2016年12月7日
- 楊嘉玲、趙淑珠(2009)。〈遭遇伴侶暴力之未婚女性其關係抉擇經驗探討〉。《輔導與諮商學報》，第31卷第2期，頁43-67。
- 楊嘉玲、趙淑珠(2011)。〈影響未婚受暴女性關係抉擇之因素〉。《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第29期，頁37-70。
- 楊靜利(2004)。〈同居的生育意涵與臺灣同居人數估計〉。《臺灣社會學刊》，第32期，頁189-213。
- 陳毓容(2011)。〈談婚前同居關係與婚前教育之現況〉。《家庭教育雙月刊》，第34期，頁56-63。
- 鍾宜吟 蔡明璋(2008)。〈婚前同居、婚姻價值與婚姻滿意度：臺灣民眾的分析〉。《研究臺灣》，第5期，頁45-72。
- 劉珠利(2012)。《創傷女性與社會工作處遇模式：人際取向、協同合作、反壓迫》。臺北：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 Abramsky, T., Watts, C. H., Garcia-Moreno, C., Devries, K., Ellsberg, M., Jansen, H. & Heise, L. (2011). What fac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recen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indings from the WHO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BMC Public Health*, 11 (109), 1-17.
- Brownridge, D. A. & Halli, S. S. (2002). Understanding male violence against cohabiting and married wome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ith a synthesized model.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7 (4), 341-361.
- Brownridge, D. A. (2004). Understanding women's heightened risk of violence in common-law unions. Revising the selection and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0 (6), 626-651. DOI: 10.1177/1077801204265017.
- Brownridge, D. A. (2008). The elevated risk violence against cohabiting women. A comparison of thre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s of Canada.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4 (7), 809-832. DOI: 10.1177/1077801208320368
- Cherlin, A. (1978). Remarriage as an incomplete instit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634-650.
- Desmond, E. (1989). Male abuse of a married or cohabiting female partners: The Application of sociological to research findings. *Violence & Victims*, 4 (4), 235-255.
- Farber, N. & Miller-Cribbs, J. E. (2014). "First Train Out":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verty, Deprivation, and Trauma.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24:188-207. DOI:10.1080/10911359.2014.848693
- Flake, D. F. & Forste, R. (2006). Fighting families: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domestic violence in fiv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1 (1), 19-29. DOI:10.1007/s10896-005-9002-2.
- Huang, C. C., Postmus, J. L., Vikse, J. H. & Wang, L. R. (2013). Economic abuse, physical violence, and union formation.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Review*, 35, 780-786.
- Kenney, C. T. & McLanahan, S. S. (2006). Why are cohabiting relationships more violent than marriages? *Demography*, 43 (1), 127-140.
- Manning, W. D., Longmore, M. A. & Giodano, P. C. (2018). Cohabitation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uring Emerging Adulthood: High Constraints and Low Commitmen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9 (4), 1030-1055. DOI:10.1177/0192513X16686132.
- Skinner, K. B., Bahr, S. J., Crane, D. R. & Call, V. R. A. (2002). Cohabitation, marriage and remarriage. A comparison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over tim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3 (1), 7-90.

- Stet, J. E. (1991). Cohabiting and Marital Aggression: The role of social isol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669-680.
- Wong, J. Yuen-Ha, Choi, A. Wai-Man, Fong, D. Yee-Tak, Choi, E. Pui Hang, Wong, J. Kit-Shing, So, Fung Lin, Lau, Chu-Leung & Kam, Chk-Wah (2016). A comparison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associated physical injuries between cohabiting and married women: a 5-year medical chart review. *BMC Public Health*, 16:1207, 1-9. DOI: 10.1186/s12889-016-3879-y.
- Yllo, K. & Straus, M. A. (1981). Interpersonal Violence among Married and Cohabiting Couples. *Family Relations*, 30, 339-347.